

本书以1916—1928年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这一时期新闻业的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作者从新闻业的社会功能、新闻自由、新闻改革等方面入手，深入分析了北洋政府时期新闻业的特点和变化。本书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参考书。



本书是作者多年研究的结晶，力求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许多同仁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王润泽 著

北洋政府时期的 新闻业及其现代化 (1916—192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 及其现代化（1916—1928）

王润泽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 (1916—1928) /王润泽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300-11318-0

I. 北…

II. 王…

III. 新闻事业史-中国-1916—1928

IV. G21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3577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 (1916—1928)

王润泽 著

Beiyangzhengfu Shiqi de Xinwenye jiqi Xiandaihua (1916—1928)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14.25 插页 1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07 000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1916—1928)》，是作者从事新闻史教学与研究以来完成的又一部学术专著，是以她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经过补充、修改和加工后付梓的。

在中国现代史上，北洋政府时期，通指民初到“北伐”结束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约二十来年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的历史，长期以来是经常被简单化和妖魔化的。例如，一提到这段由北洋军阀统治的时期，浮现在眼前的，往往是一幅幅“城头变幻大王旗”和各系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尔虞我诈、穷兵黩武的混乱场景。具体到新闻史，经常想到的也往往是这段时期发生过的多少家报纸被封、多少家报纸被传讯、多少家报纸被捣毁、多少名记者被杀、多少名记者被捕入狱的“癸丑报灾”，给报纸出版以诸多限制的1914年颁布的《报纸条例》和1918年颁布的《报纸法》，以及邵萍、林白水等著名报人在不到100天内双双被捕遇害等场景。总之，那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端黑暗的时期。

其实，这是把历史过分地简单化了。上述的那些史事都完全属实，但只反映了北洋政府时期历史的一个侧面。因为那个时代毕竟是一个渐进中的和多元化的时代，是一个五色杂陈，瑕瑜互见，各种国内外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各种主义、各种学术观点、各种思想主张、各种宗教信仰，乃至各种文学艺术流派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寻求发展的时代。每一个方面都拥有自己的活动空间。一切正面的或负面的事物和观念，都在充分地展示自己，都在通过各种媒介大喊大叫、扩大自己的影响，都在争取社会的认同，都在以各种方式进行着较量。除了负面的事物和观念之外，这一时期其实还有不少非负面的东西。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各种社会思潮如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兴政治力量的诞生如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军事“北伐”和大革命的发动，“兼容并包”的大学办学理念 and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学风的建立，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媒体上的“文人论政”和“处士横议”，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这一时代，都是这个多元化时代的产物。在当时，各派军阀政客和政治势力之间，既要研究拳经，也要讲点“行规”和游戏规则，他们之间不仅打武仗，也打文仗。看看那一时期报纸上登载的连篇累牍的互相声讨的“通电”，就可以看出，他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描写成真理和正义的化身、国家利益和宪政的维护者，而把罪恶和责任推给别人——好人和坏人并不是简单地刻在人们的脸上，让人一望而知的。在经济上，这一时代也被认为是“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对外贸易总值从1918年的10.4亿两增至1923年的16.7亿两，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13.8%。^①这样高的增长率，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绝对是空前的，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似乎也不曾有过。总之，这段时期虽然是军阀混战的年代，但是，教育、文化、经济、社会等领域仍然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现代工商业、现代大学、现代学术、现代社会的组织形态仍在迅速发展。其间的某些成就，是可以载入史册，垂之久远的。

新闻事业也是这样。北洋政府时期，除了个别报人的无端被害凸显了屠夫的凶残之外，总体上看，这段时期其实是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得比较快的一段时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给办报活动提供了象征性的支持，办报因此是可以自便的，只要你不怕赔钱和被无端查封——查封了，也还可以改头换面再办。实际上，民办报纸在袁世凯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确实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数量由1912年的250种增长到1927年的628种；旧中国资格最老、影响最大的《申报》、《新闻报》，都在这段时间进入了它们办报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两报的大楼，旧中国最好的两座报业建筑，都落成于这一时期；20世纪上

^① 参见费正清总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册，736～73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半叶影响较大的几家报纸，如北京的《京报》、《世界日报》，天津的《庸报》和新记公司的《大公报》等，都创始于这个时期；中国最早的报业集团出现于这个时期；国共两党的不少有影响的党报创办于这一时期；最早的新闻学团体、最早的新闻教育，也都肇始于这一时期……以上这些都说明，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事业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应该是中国新闻史上很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时期。

但是长期以来，这段时期新闻事业史的研究，除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办报活动的历史和个别大报的历史外，大部分都被忽略了、被淡化了、被简单化了。这不能不说是整个中国新闻史研究，特别是中国现代新闻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缺陷。

作者的这部专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虽然她把重点放在1916至1928年这个时间段，略去了民初特别是袁世凯执政的那段时期，但并不妨碍她对整个北洋时期新闻事业情况的把握，和由此作出的全面深入的概括和分析。这部书不仅对这一时期的官办报纸、政党报纸、商业报纸、宗教报纸、通讯社及广播电台等各种媒体分门别类地作了介绍和研究，也对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运营模式的现代化、新闻理论和新闻理念的现代化作了一定的探讨，它将有助于对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全面了解。

作者早年从事过新闻工作，曾经是一位出色的电视记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而从事中国新闻事业史的教学与研究，成绩斐然。她治学严谨，开掘较深，注意掌握第一手材料，力求做到言必有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与此同时，她还有较开阔的学术视野，善于借鉴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从事新闻史的研究。所有这些，使得这部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它的出版，弥补了中国现代新闻史研究的不足，是值得欢迎的。

方汉奇

2009年3月15日于北京宜园

前 言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的转型时期，在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该时期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变幻莫测的时局变迁，催生了生机勃勃的媒体、生动活跃的报人。以往对该阶段的研究多以批评揭露北洋政府对新闻业和报人的迫害为主，但实际上那时的媒体环境整体相对宽松，媒介发展比较迅速。当前，随着学术界研究对史实真实性的重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真实的历史面目和评价开始出现。比如经济史开始肯定该时期中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功绩，法制史和政治史开始肯定该时期对中国现代司法制度和民主制度建设所做的努力和尝试，而在我们新闻业发展的历程中，种种迹象也表明该时期是媒体发展的又一黄金时期——现代化的报馆大楼已经在中国大城市出现，高速轮转印刷机开始在报馆应用，电报、电话等通信技术成为新闻传递的重要手段；同时，传统商业报业开始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符合现代媒体运营的内部机构设置和人事制度、福利制度开始出现；发行和广告收入成为报刊经济的重要来源；新闻采访业务走向国门，采编业务越来越符合现代新闻业的要求；新闻理论也在不断发展，除了西方的新闻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外，中国的新闻界也对自身进行了理论性反思；令人振奋的报团开始出现；新思潮涌动，来自西方的民主自由等资本主义启蒙思想和社会主义救国主张在报刊上大放异彩；而颇具中国特色的以“文人议政”为内涵的报刊，在经历了王韬、梁启超等人的探索和实践后，也开始显示她走向成熟的魅力……所有的线索表明，该时期正是中国新闻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阶段。因此，对该时期进行系统研究有重大的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该阶段新闻史研究已有一定基础，取得了一些成就。



首先，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里有相关内容的介绍。该书是按照报纸的类别来划分的，主要涉及“官报独占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虽然一直写到1926年，但民国成立后的报刊历史只有短短的四节内容，分别是：（1）两度帝制之倏现，（2）杂志，（3）国内外会议与我国报界，（4）结论。其中所涉及的1916年后的报纸基本没有，杂志也仅35份，大部分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它留下了报界之现状，新闻、广告、发行、销数、印刷、纸张、用人、副刊及小报、图画与铜版部分地展现了当时媒体的状态。

方汉奇教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中有关该时期的研究，是目前新闻传播史界较权威和深入的研究，基本成为当前中国新闻史教材和各种通史对该时期表述的蓝本。该著作第七章的第四、五、六节分别论及以下问题：

第四节：（1）报刊言论出版自由继续受到限制，（2）办报成为一部分资产阶级文丐卖身投靠、营私牟利的手段，（3）多数报纸的馆舍和编辑出版条件十分简陋，（4）新闻业务工作有所改进，但进展不大，（5）以“鸳鸯蝴蝶派”为中心的报纸副刊和小报、期刊泛滥一时，（6）通讯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五节：（1）民初的新闻记者和新闻学研究活动，（2）涉及的代表人物：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刘少少、徐凌霄、胡政之等，（3）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第六节：新思潮的传播和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报刊活动：重点为鲁迅，其次为李大钊和陈独秀。

以上是国内关于该时期新闻业历史的主要研究内容，其余研究基本没有跳出这个框架，如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新闻史著作——方汉奇教授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有关该时期的论述：第二卷第八章第四节“北洋军阀对新闻事业的统治”：（1）各派军阀的报刊活动，（2）北洋军阀对新闻事业的摧残，（3）邵飘萍、林白水的被害，（4）人民群众在新闻战线上的斗争等，基本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编录；另外，在“民国初年的新闻事业”、“五四运动时期的新闻事业”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等章节中，也有从不同侧面

和角度研究的内容。

台湾曾虚白教授的《中国新闻史》中，相关内容散布在“民国初年的报业”、“从‘五四’到‘北伐’的报业”等章节里，其中谈论到的1916年后出版的报刊不多，但从报纸企业化的角度作了少量论述；赖光临教授的相关著作中关于该时期的介绍也基本相似。

其次，在个案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针对著名报刊和报人的深入研究，如邵飘萍和《京报》，陈独秀与《新青年》，胡政之、张季鸾与创办时期的新记《大公报》等；五四运动时期新闻业务的改革进步，如俞颂华、瞿秋白等的苏俄采访，四大副刊，言论发展等，也属该时期的研究范围。

但北洋政府时期新闻事业史的研究也还有不足。

首先，整体性研究缺失。目前关于该时期的研究多以个案为主，包括报纸、报人、新闻事件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有系统性的研究。

其次，现有成果在研究框架和体例上比较传统。研究框架一般按照以下几个阶段展开，民国初年、五四运动、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实际上这样的划分是将新闻业发展的历史简单等同于革命史了。新闻史的研究与革命史的研究应该有本质性的不同，因为媒体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只是媒体功能的一个部分，革命派中的媒体人也只是所有媒体人的一个部分，甚至革命性也只是这部分人复杂个性和政治属性中的一个侧面，不能简单地以革命史的线索替代新闻史研究的线索。新闻史的研究应该有自己的规律，符合自己的特点。在研究体例上，一切和革命有关的报纸和报人都被强调，与革命无关的新闻事件都被掩盖，新闻的历史被政治和意识形态分割了，失去了自身发展的连续性；这种状况也存在于个案研究中，对单个报纸或报人也是用政治色彩来区分，与正统颜色相近的突出出来，其他的掩盖起来，这样，人物和报刊的历史常常是“神龙见一段”的感觉，有时是“见首不见尾”，有时是“见尾不见首”，有时是只见一个侧面而没有整体，有点“以论带史”。

再次，研究结论比较单薄、片面。由于北洋军阀脱胎于“窃国大盗”、“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因此被统统贴上了“没落”、“腐



败”等贬义标签——作为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的敌人，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北洋军阀的落后和劣迹被挖掘出来：囚禁张季鸾、曹成甫等记者，捕杀邵飘萍、林白水等报人，查封报馆，钳制新闻自由，“三一八”惨案等。但这只是事实的一个部分，其实还有另一部分：媒体对政府和政界人士可以比较公开和自由地批评，媒体和舆论界显示了比较强大的力量，如“三一八”惨案后，在社会舆论强大的压力下，段祺瑞自动辞职，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由于（或部分由于）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力量，导致政府倒台的事件；同时伟大的五四运动也是爆发在这个时期；而在新闻业务领域，中国新闻界更有长足进步……种种迹象显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新闻业有其生动活泼、积极发展的一面，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评价。

本书研究中，笔者考虑较多的是采用何种路径和方法^①。对前文所说的新闻史研究有太多革命史痕迹的倾向，本人也一度抱批评态度，故在研究中，尽力摆脱“革命史体系”的传统模式。但今日，我较认可那种研究是结合当时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过程进行的。简单地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包括新闻史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史，用革命史的框架进行研究，比较能说得清楚，也部分符合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而对于新闻学来说，用此方法也能对新闻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全面和深刻的解读。不过现在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历史在不断地前进，社会也在不断发展，学术界慢慢不再以阶级斗争、革命斗争作为梳理历史的线索，而是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民主政治、社会进步等作为研究参照和目的，因此“现代化历程”越来越成为适合时代需求的历史研究体系。中国近现代史即从经济史和社会史作为突破口，产生了令人瞩目的活力。新闻史的突破口在哪里？很多学者做了有效的尝试，而本研究中，关注了新闻业自身现代化的过程：这只是研究新闻史的一个路径，这个路径的特点是，能发现新闻史内在的一些要素，对认识当时的新闻界

^① 这也是笔者在新闻史研究中考虑较多的问题。参见王润泽：《专业化：新闻史研究的方法和路径的思考》，载《国际新闻界》，2008（4）。

自身发展有帮助；但对研究新闻界与外界的联系，比如与社会的互动、与政治的关系等方面涉及不深——就像认识一个人一样，有的倾向从内在的方面看，如性格、品德、思想；有的愿意从外在的方面研究，如社会关系、地位、职务等。我想我的研究路径为前者，这就让我的研究兴趣落在新闻业的一些内在因素上，而这些因素如要说得清楚，从现代化的角度切入更合适。

需要强调的是，本书的目的与其说要为新闻业的现代化理出一个标准来，不如说仅想展示在某个特殊时期新闻业现代化的一个过程。现代化理论十分庞杂，本书并不想涉及复杂的理论问题，只是取“现代化”的“理想型”（ideal type）之意，在已被普遍接受的现代化的三个层面，物质层面（或器具层面）、制度层面、思想层面的基础上，按照新闻业自身现代化的构成层次进行展示。费正清指出“每一领域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各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定”^①，对“学科专业术语”的强调，实际上是突出了现代化进程中每个专业的独立性和独特性。这说明现代化的过程有共性，但更有个性。因此笔者在界定中国新闻媒体的现代化标准时，将其分为五个方面——物质基础、组织结构、媒体经营、业务和理论观念分别阐述。

还要说明的是研究时间的界定。北洋军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大部分史学研究者对北洋军阀的界定是将袁世凯包括在内的，但也有部分人认为北洋军阀是指北洋军队中隶属于袁世凯的年轻军官们，如段祺瑞、吴佩孚、冯国璋、曹锟、张作霖、阎锡山、孙传芳等，他们在袁死后武力割据，分占中国。以前者的标准，北洋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应该从1913年算起，直到1928年；以后者的标准，该阶段应从1916年算起，直到1928年。其实在新闻业的发展过程中，1913年到1916年与1916年到1928年还是有诸多不同的，基本可以看作两个时期。第一个阶段为袁世凯统治时期，中国报业遭受巨大戕害，“癸丑报灾”即发生在该时期；第二个阶段，中国新闻业在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本书以1916年到1928年作为研究范围。

^①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在研究内容上，因为以新闻媒体为主，所以当时很多比较重要的文学类、专业类和学术类期刊并没有包括在内。这里要澄清几个概念：媒体是指包括广播、报纸、杂志、通讯社等当时已经存在的媒体形态；新闻媒体是能够报道新闻的媒体——当时新闻媒体的主流是报纸，电台的主要功能不是播报新闻，因此对广播电台的论述不是重点，研究的重点还是报刊，特别是后五章对新闻媒体内部运作方面的研究多是在报纸领域开展的；新闻业的内涵是指整个新闻媒体及其全部业务领域，包括新闻媒体形态、经营管理、采写编评等业务领域。笔者在梳理新闻媒体的过程中，将报刊主要分为官方报纸、政党报纸、宗教报纸和商业报纸，将新闻性不强的官方报纸和宗教报纸放入其中，除了因为这两种报刊中也有部分新闻报道外，主要是考虑到该阶段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性。

作为本书原型的博士论文在答辩中，以下特点得到大家的认可，比如，“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征引了国内外和海峡两岸有关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大量研究成果，既有深入的个案研究，又有一定的面上的综合概括和量化分析，执笔时力图摆脱传统新闻史研究的思维定式和写作套路，在以上两方面做了不少新的探索，自出机杼、颇多新意。是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的一部有分量的断代史研究成果”（导师语）；“论文结构上摆脱了传统新闻史研究的套路，回归新闻业本体，按照新闻业自身的类别、结构和发展特征划分研究板块，将局部和个案性质的新闻史研究纳入整体性的断代史研究中，研究的系统性得到强化。这种研究结构的重新架构，值得肯定”（答辩委员会）等。

但在据论文改编的本书即将出版之际，笔者内心并不轻松。

首先，本书关注的是一个阶段的新闻史，而我能收集到的资料，仍不能充分论述那个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确切的面貌，有时甚至只能管中窥豹，描绘几个侧面，好在这些侧面对我来说还有一定的研究兴趣。

其次，由于本书体例和相关史料的局限，使得论述的角度和重点前后有些差异，前半部分着重挖掘该时期不同类型新闻业的发展状况，后半部分则更多关注于新闻业内部的情况。当然，这样安排

主要是考虑到研究体例上的继承与创新关系，前半部分更多是继承以往优秀的研究体系和框架，后半部分主要是我个人研究的兴趣所在，我更愿意关注新闻事业的内部运作。

再次，对新闻媒体的梳理上，由于篇幅和精力有限，一些比较重要的报刊种类并没有单独成章进行论述。如外国人在华媒体、“文人论证”的媒体，只是在一些章节中作了顺带论述；在政党报纸中，民主共和一进步党的报刊实际上办得很好，但由于该党历史地位不及国民党和共产党，也由于笔者精力有限，没有太多论及；类似的情况还存在于商业报纸部分的内容中。另外，一些内容的安排也不是很完美，比如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在新闻理论上是非常重要的创新，但我考虑再三还是把这部分内容放在了介绍共产党报刊的章节中。而不是新闻理论创新的章节中。这主要是因为“新闻理论和观念的现代化”部分，侧重一些学术性和普通报人（非政治家兼报人）的观点，这样安排更能反映这个领域的常态。

最后，由于自身对新闻业务领域认知兴趣点的影响，我并没有全面地分析各个领域内的所有要素。这一方面由于我驾驭一个较长时期通史的经验 and 能力有限，另一方面，也是我个人并不愿意做面面俱到的尝试，因此并没有结合文化史、社会史和思想史进行研究，也就看不到该时期新闻与政治、与思想或与文化的深刻关系——在本研究中，我只想弄明白一件事，即新闻业自身发展的情况如何，并在此论题下做一些细节的讨论，让人们体会到新闻历史的多姿多彩和不同侧面。

以上缺憾只好在日后的研究中再弥补了。

目 录

第一章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新闻业概况 / 1
	一、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新闻业的历史环境 / 2
	二、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新闻业的概况 / 24
第二章	官方报纸 / 39
	一、官报的管理体系 / 39
	二、北洋政府所属的中央级官报 / 43
	三、国民党主政的历届政府官报 / 53
	四、东北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官报 / 58
第三章	政党报纸 / 68
	一、国民党的宣传与报刊 / 69
	二、共产党的报刊宣传 / 95
第四章	商业报纸 / 124
	一、商业报纸的界定 / 124
	二、商业报纸的初步繁荣 / 125
	三、商业报纸的地域分配 / 128
第五章	宗教报纸 / 142
	一、天主教报刊 / 142
	二、基督教报刊 / 157
	三、其他宗教的报刊 / 168



第六章

通讯社及广播电台 / 181

- 一、通讯社 / 181
- 二、广播电台 / 196

第七章

新闻业物质基础的现代化 / 201

- 一、馆社与图书资料中心 / 202
- 二、通信技术的现代化 / 208
- 三、印刷设备的现代化 / 216
- 四、现代化物质基础的主要障碍 / 224

第八章

运营模式的现代化 / 230

- 一、报馆的经营方式与组织结构 / 230
- 二、人员安排设置 / 239
- 三、人员工资与福利待遇 / 256

第九章

媒体经营的现代化 / 262

- 一、资金来源 / 262
- 二、报纸的发行 / 271
- 三、广告的经营 / 284

第十章

新闻业务的现代化 / 297

- 一、新闻的采集与写作 / 297
- 二、评论的写作 / 316
- 三、报纸编辑的进步 / 330

第十一章

新闻理论和观念的现代化 / 341

- 一、对报刊的认知 / 341
- 二、对新闻的认知 / 352
- 三、新闻伦理与对新闻自由的认知 / 357
- 四、新闻团体的发展 / 360

结语 / 369

附录 / 371

主要参考书目 / 428

后记 / 435

作者简介 / 437

1916年到1928年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①，政治上颇为混乱，西方学者称之为北京政府时期，定性为“立宪共和国”，意思是这段时间中国虽然处于实际的分裂状态，各路军阀穷兵黩武，但共和思想和体制却在动荡中渐渐被人们接受。而之前的1912年到1916年，国家形式上统一，代表独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制度已经建立，但在封建思想和外国势力左右下，民主共和的思想和体制极为脆弱。之后的南京民国政府又开始在统一的状态下治理中国，呈现出一派新的景象。

从1916年到1928年，分裂的国家，互相牵制、斗争的政治军事集团，混杂着不成熟的共和自由体制和自由民主思想，客观上为媒体发展营造了相对自由和宽阔的空间；中国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为媒体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同时，无线通讯、印刷技术等现代技术的发展也为该时期新闻媒体的形态变迁提供了可能。

^① 北洋政府时期通指民初到“北伐”结束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的一段时期，即1913年到1928年，而本文的研究范围是1916年到1928年袁世凯去世后的这段时期。笔者在序言中也有提及。